

遠望集

下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的统一：一个宇宙的新图像

洁西卡·罗森 (牛津大学 墨顿学院院长)

前言

公元前221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分水岭，秦王政最后消灭了六国并自称是秦始皇帝。这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或多或少也同样地深刻影响随后的宗教信仰和物质文化。本论文将藉由考古资料，特别是那些刘姓皇室家族墓葬出土资料，呈现关于死后世界信仰的改变。保存良好的汉代漆器、青铜器以及陶器将是用于解释此一新观念和习俗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本文将探讨秦始皇征服六国及汉统一之后对宇宙观的主要改变。对于宇宙和万物的观念大大地受到楚文化和信仰的影响。这些提供了关于宇宙的描述以及居住在不同地区的神灵等概念。从楚又发展出对于人、所有的统治者和宇宙的关系。但就物质文化的观点来看，汉帝国西北边境的地区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至于宇宙的图像则是来自伊朗、中亚以及西伯利亚的动物形像。甚至中国人最珍爱的玉雕也随着这些外来的动物而改变造型，特别是狮子，在中国它以不同外貌如老虎、熊甚至于饕餮出现。

“宇宙的图像”这个措辞是本文的主要主题，虽然它也有隐喻性的弦外之音：首先，我们有来自马王堆帛画的实际图像（图1）；再者，从那些完整的墓葬中，特别是刘氏皇室家族的墓，呈现了墓主来世身处于整个宇宙当中的图像，其中包括了好与坏的、天国与神灵等概念。本论文将讨论实际性的及概念性的宇宙图像，而在结论我则简短的提出此一图像在信仰背景的角色及当时的哲学观念。

政治的改变把中国许多地方的特色融合在一起，然而有三个地区特别具有影响力——现今湖北、湖南地区，公元前278年为楚国所统治；中国东部，上半部属于齐国、鲁国，下半部属于吴、越，后来也为楚所统治；以及中国西、北部地区，帝国边缘之外，被视为神灵领土地带。所有这些地区随着政治的统一，掌握在秦与汉帝国手中，之后秦与汉帝国开始探查和开发那些他们所控制下的地区或邻近的领土。因为帝国的首都仍保留在西部的西安，在原秦国境内，因此黄河流域盆地的传统、信仰和习俗自然地成为新帝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本文将专注在物质文化的探讨，在这方式之下我将列举一些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状况。首先，本文将介绍为什么楚的艺术品、习俗和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在秦朝，特别是在汉代的宇宙观扮演着压倒性的角色。这个明显的局面是政治因素的自然结果。首先，公元前三和四世纪秦国作战的结果导致湖北和湖南等楚地的被征服，楚被驱逐向东，于是秦窃取楚部分领土，也因为如此，秦接收了楚的习俗和物质。湖北云梦秦朝的墓中显示了混合的随葬品，例如在当时是秦物质文化特色的蒜头形壶，以及具有楚文化特质的漆碗和耳杯¹。自楚的被迫东移，部分现在的安徽和江苏感染了许多楚文化的特点。汉代的刘氏家族统治者来自这地区，现今徐州地区，这地区后来成为汉代的楚国²。于是我们发现，此地遗存的物质兼具有楚和东方的典型特色，这些习俗自然地汉代皇室所引用到首都长安去。

我将归结这些壮丽的、具有许多不同功能的空间的墓室是传承于楚的文化，然而选择在山侧凿墓室的概念（从坚硬的石头中挖空成墓室），可能另有来源。汉和之前的秦也从楚地学到把日常器具和设备，特别是漆器，埋在他们的墓中，对音乐和舞蹈的强烈兴趣也是来自楚地。楚提供了有关那些迟钝的人物模型将在来世变成适意的奴仆的信念，于是产生了秦朝的兵马俑和汉代的小型陶俑军队，秦和汉也制造了陶模型或木模型的仆人和舞者。从南方学习了描绘神灵并得助于它们的力量去抵御恶魔侵袭的概念。最后，不论是来自诗文或图像，关于描述整个宇宙许多不同地域的概念似乎是来自楚地，虽然东部地区也是重要的影响。

当自然的及心理的宇宙所呈现的形式起源于大部分楚地时，被描绘居住在这宇宙的生物却源于西伯利亚、中亚和伊朗，透过西北的游牧民族传到中国。许多这些栖息在宇宙中的生物，不论是真实的或是想像的，可能不被认为是来自帝国西北边境的游牧民族，而是来自神灵居住或统治的遥远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武帝的西征或许是受了寻找这些神秘国度的刺激^③。选择山上作为墓地的诱惑或许一部分来自西亚或西伯利亚。在石头上铭文，不仅是秦始皇也包括他的后继者，也许是模仿自西亚铭文的传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艺术中唯一最重要的生物——狮子，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中间地带有深远的影 响，然而在中国狮子为老虎、豹或熊所取代，这些形式变换不仅表现在金属工艺设计上，并意想不到地出现在玉雕上。在此我将引证其它来自西北地区的动物特色，特别包括相斗的动物、鸟头、出现在巨大鹿角之后的鹿、有翅膀的生物以及在建筑上用来支撑梁柱或石板的女像柱。所有这些呈现在许多汉代艺术品上。金、银及鍍金等物质明显地是由西方引进的，且被用来取代楚漆器的造型，一些特殊的容器造型，特别是叶状的盒子和来通（*rhinton* 牛角形器）均源自于西亚（图5）。

另一方面，巨大的影响来自于东部的中国，特别是齐国和鲁国的风俗对秦与汉有着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早在西汉之前这些邦国在习俗和器物造型上似乎已经同化了，前者如香炉（虽然这习俗也可能发展自楚国），后者包括来自西北地区似狮似虎的生物。一些西伯利亚或甚至塞西亚（*Scythian* 黑海边的一个古国）的特色甚至出现在更早时期，例如临淄地区的大墓，墓主被认定是景公（547—489 BC），墓四周以著名的塞西亚墓葬的方式，如在高加索山（*Caucasus*）的卡斯同卡加（*Kostromskajia*）的墓，环绕着超过六百匹排列整齐的马（图3）^④。其它在山东地区的墓葬似乎也承袭塞西亚的丧葬习俗^⑤。此外，角形的小型水晶串饰，也许是模仿自塞西亚或中亚的例子（图4）^⑥。

事实上，许多西伯利亚和塞西亚的习俗和物质借着许多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国，并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之前被选择性的采用。当侯马晋国铸铜设计混合伊朗、塞西亚和西伯利亚黄金工艺特色（如带翅的半狮半鹫怪兽、狮子头经修饰成老虎或饕餮头像、老虎或猫样动物以及半狮半鹫的鸟攻击或毁灭其它生物）的同时，黄金工艺和铁制的武器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已经抵达秦国^⑦。使用于湖北、河南地区的黄金扣饰，或许也保存有塞西亚和伊朗地区的原型^⑧。我们将会讨论有关西伯利亚的艺术及生活随着在河北平山建立中山国的狄族进入中国地区的其它观点。精巧的镶嵌青铜器、老虎食鹿以及帐篷的铜构件等，都是在此被选择采用的西伯利亚习俗^⑨。

在这背景之前，我们可观察到西亚器物类型和纹饰设计的特色在齐国被使用，例如叶状纹青铜器和银盒以及新类型的玉雕^⑩。当楚国被迫东移时，许多楚地的传说结合了东方的习俗、信仰和工艺品。不论是秦始皇或是汉代的统治者负相当大的压力在控制东方。《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着秦始皇在东巡途中明显地停留并铭文在这些地区，似乎是捕捉和吸引它们神灵的注意：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北京中华书局 1959，P.242）

轮到汉武帝时，他追随秦始皇的脚步东巡，祭祀泰山和其它遗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刘氏皇族，不是选择便是被指定去统治这些东方的领土。

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皇室成员特别重视这地区？似乎很可能部分由于重视这地方接近神灵的可能性。选择山作为永久住处与齐国对神灵的崇拜发生在山上有关。这些崇拜也许部分发展于和南西伯利亚居民接触的结果，从他们那里传来了不寻常的墓葬类型和水晶佩饰¹¹。除此之外，其它不死仙人传说居住在东边海上某处的蓬莱仙岛上，因此东方遂成为吸引刘氏皇族的地方，因为山有可能成为永生的居住地并且距离蓬莱仙山不远。

再者，由于东边的南半部曾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产生地，这些意外发掘于新石器时代墓中的玉，可能被视为一种奇迹，于是很可能的齐鲁、安徽等地把玉璧铺盖在死者身体的习俗是由此而产生的¹²。玉也被用作棺椁装饰、玉衣、个人饰品及器具。事实上，南方的楚使用丝、木质品和漆器，而在东方这些柔软的、易腐朽的物质被玉器所取代。在这关联上，远在南方广州的南越王墓可视为东方埋葬类型和信仰系统延伸的例证¹³。南越王墓以精巧的玉器闻名于世，其中许多和公元前三世纪末安徽楚地及山东齐地有紧密关联。除此之外，它也呈现了源于西方的题材和特色，包括了帕提亚（安息人 Parthian，伊朗北部古国）式的银盒和玉角杯（rhyton 来通，图 5）。

神灵世界的统一

本节主要讨论当秦与汉统一和治理他们的帝国时，他们宣称统治包括整个已知的宇宙，因此按照 Lewis 的说法¹⁴，这包含了宇宙中的神灵、鬼神和上帝¹⁵。对汉及他们的祖先而言，他们从不怀疑神灵世界的存在。

关于秦始皇的雄心最为显著证据是他选择了皇帝这个封号，这个封号和黄帝是相同的。虽然关于黄帝的原始信仰并不是很清楚，但对黄帝的信仰似乎在齐（也许也包含楚）特别重要¹⁶。宣称此一同意义封号的同时，秦王政致力把自己置于宇宙中黄帝的左右，不仅是人间的宇宙，并包括神灵和其它帝的宇宙。

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生活的报告以及他对于封禅的讨论，提供我们足够的证据去了解当时的信仰，和两位皇帝为何致力去驱使所有已知宇宙的神灵以供自己使用：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北京中华书局 1959，P.1371）。

在这些汉皇帝把神灵的崇拜并入皇室的礼仪中，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对八通鬼道的祭祀（所有都和齐地的山有关），以及对太一的祭祀（太一帝，从楚墓中出土的武器得知）¹⁷。据司马迁所描述，这些神灵除了有特异的力量之外，太一具有更崇高的身份。司马迁详述谬忌指示武帝祭祀太一的话：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

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北京中华书局 1959，P.1386）。

每日的生活以及建筑物和纪念物的结构，必须考虑符合所有天体的位置和优点，包括星辰。关于秦始皇的阿房宫，司马迁描述：

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北京中华书局 1959，P.256）

在这风俗之下，建筑物，特别是宫殿，建造在相互间的关系上，如同天上的星辰。在此“象（象征）”这个字被用来解释这种关系。在下一个部分我将描述墓室结构，也许也是建筑在“象”或模仿宇宙的关系上。本文中“象”这个字是用来指示墓室结构及随葬品呈现“符合宇宙特色”的图像。

这两个帝王所担心的不只是适当留意祭祀和建筑，以产生和天帝及神灵的和谐，并且关心到他们必死的命运。秦始皇和汉武帝皆寻找能够帮助他们与神灵沟通，并找到不死之药的方士。“方士”这个名词按字面意义解释为来自远方（非首都地区）的特殊专才¹⁴。换句话说，秦与汉寻求并采纳那些能够从遥远地区的神灵和天帝处得到奥秘知识的方士，特别是那些来自极北和极西或是遥远的东方岛上。从这些忧虑发展出这些皇帝试图营造他们所知永恒宇宙的形式（也就是“象”的感觉）。就在这观点上，这些墓室和随葬品必须被了解。在这论文的第一部分，将思考整个墓室所呈现的宇宙形像，而在第二部分，则将略述另一种宇宙的图像。

第一部分 墓室和随葬品

石材和砖石墓室结构

虽然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去了解秦始皇详细的墓室造型和结构，然而就司马迁对他的墓室装饰的描写——上具天文，下具江河——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型的多室墓而不是木椁墓。它大概至少和公元前五世纪末，大型且复杂的湖北曾侯乙墓一般¹⁵，或许更为精巧。然而，由于它地处陕西省中心，就时空而言介于早期国王墓葬的延续，因此它也很可能是相当传统的竖穴轴心墓。从司马迁更多的描述有关熔铜铸棺的使用，暗示着此一耐久的材料已被用来取代早期的传统木棺。然而从汉代的墓葬中我们得到更多信息。汉文帝离西安不远的墓，据描述为水平挖入峭壁表面的墓¹⁶。在这黄土高原的中心，此一凿岩为墓的结构被描述比山东和江苏地区凿山为墓更难。我们知道凿岩为墓是从中国东北部和东部丘陵山区一些重要的、巨大的刘氏皇族首先发展出来的，主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徐州楚王墓、永城梁王墓和山东鲁王墓，这些墓都局限于江苏北部、河南东部以及现在的山东南部¹⁷。最为人知的是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和他妻子窦绾的墓（图7）¹⁸。然而他们的墓室格局比我们将要讨论的其它墓为小。

在徐州小龟山、北洞山及狮子山等主要墓中（图6）¹⁹，他们都有长的墓道，墓道两旁具有许多小墓室。棺室往往摆在后部，其它尚有接待室、厨房、谷仓和储藏室等组合成像宫殿一般。在龟山墓中，墓主和他配偶分开的卧室在后厅中接连在一起。最为人知的河北满城汉墓有一个较为简化的格局（图7），而在永城梁王墓中这些墓室结构显得更为复杂。

然而这墓室结构的主要因素从哪来呢？我们将在别的例子中发现，部分来自楚文化的习俗，部分来自中亚和西亚。典型的楚墓具有木制结构的内棺、外椁及隔间。此一类型墓室最

为复杂和最早的例子便是刚刚提到的公元前五世纪末楚国北边的小国曾侯乙墓²⁴。曾侯乙墓具有一个供音乐和祭祀的中央厅室,一个较小的摆置内棺的私人厅室,一个摆放随葬人员棺木的厅室和一个放置车马器和武器的房间。后期的中等阶级楚墓显得更为扼要,往往只具一个供内棺的中央厅室和围绕在四周小小的四方形隔间,使得它成为早期较高阶级墓室的简化版本²⁵。曾侯乙墓中的房间和楚墓中的房间不但具有不同大小和位置,更具有不同的功用,例如乐器提供娱乐或宗教仪式,仆人附随日常用品和镇墓兽抵御恶魔的侵袭,所有在这房间模型的人物均被安置在适当的位置。

汉代(或许经由东方)对墓室房间具有不同功用的概念源自于楚,汉墓最重要的改变是刘氏皇族决定在山边挖凿墓室的结果,此外产生了几乎水平的通道,有时是在挖出连接通道的水平房间前选挖出具大的垂直轴心。在一些墓中,部分房间或附属的房间有时是由石板建成的,这些石板多少和南方楚国木板的特色相关。

然而这岩石和山崖的墓葬为何吸引这些刘氏皇族呢?为何在使用几千年的竖穴木椁墓之后又产生这些石室宫殿?在此我将强调这可能是源自西方的形式。在伊朗奈可斯伊罗斯顿(Naksh-I-Rustam)的地方那些阿凯蒙尼德(Achaemenid)国王的墓都挖入峭壁中²⁶。这些伊朗的墓通常都很简单,仅有一排房间紧随在墓室建筑的正面。如果不明了伊朗和中国的接触,在他们各自平行发展的情况下,这些特点似乎不具任何意义。然而在西亚其它地区,特别是埃及,他们建造了更为广阔的墓²⁷。再者如我所提,早期齐国的墓葬特色,例如山东临淄河崖头便是很可能透过游牧的塞西亚或西伯利亚民族得知中亚的习俗,并且因为这原因他们继续与西伯利亚人、中亚人和伊朗人接触,并对他们的习俗感到兴趣(图3)。同时我们将看到,其他凿山墓室的特色也是源自于西方。因此在较广的背景之下,这来源似乎很有可能。

这些刘氏王族的巨大石头豪宅稍后也为阶级较低的官员所模仿。一些墓并由画像石所构成,甚至有些更小格局的墓仅由石棺所组成²⁸。最为明显源自伊朗或南俄的例子是位于江苏昌黎水库,具有层次的拱形圆屋顶和中心圆柱的石板墓(图8),这些圆柱通常是具有简化的底部和顶端的小平面。偶而如徐州附近的白集村,这些圆柱便建筑在雕刻动物的台座上。这些具有层次的拱形圆屋顶和圆柱可以和高加索(Caucasus)科根(Kurgans)的墓作比较(图8),稍后在山东沂南的汉墓中,甚至发现有类似西洋古典圆柱顶的托架²⁹。

在中国其它缺乏石材的地区,墓室便由砖块所建造。首先,大的、像石板的砖块被用来建造墓室,在很多方面这些很类似石板墓室。稍后,较小的砖块被用来建造墓室圆顶和隧道拱圆形顶³⁰。这些砖制墓室建造在平面上,有一个像门的入口,紧接着墓道及休息室、一个中心接待室、储藏室以及像起居室一般摆置棺床的后厅。下一个阶段是小型砖块用来建造墓室(包括拱圆形墓顶)的产生。因为砖制拱圆形墓顶不是中国的建筑类型,且在当时没有发展成生活用建材。似乎很可能和凿山墓室以及石板墓室一样皆模仿自西亚的造型。大部分帕提亚人所建筑的砖制拱圆形墓顶,如特西坊(Ctesiphon)仍存留至二十世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使用不同类型的此种复杂的墓室,范围包括了中国西部如四川的大型凿石墓,中国中部和南方的砖室墓。事实上,东汉墓室的发展似乎取决于西亚许多不同结构类型的经验。

当有关壮丽的、洞穴般的居室建筑在高耸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山上,如昆仑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等传说被旅行者及商人带到中国的当时,诗人以及大概那些皇室成员,无疑地把这些

洞穴和神仙的居住联想在一起。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他描述穿越山颠和山谷的神仙世界的旅程。在这文章中西王母便居住在洞穴里。

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北京中华书局1959，P.3060）

或许是这原因，宫殿可能建在山上和洞穴。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苑赋》他写着：

夷峩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椽而扞天。（北京中华书局1959，P.3026）

刘氏皇族的凿岩墓似乎就是这种宫殿的描写：挖隧道入山，产生像西王母所永远居住的新岩穴³¹。

在本文的后半，我将再一次证实模仿自汉帝国西北边境地区的物质特色，这些宇宙边境的一部分被视为神仙所居住的地方。

宇宙和宇宙的神仙

画或刻在墓室的有关天国和神仙的图像，和描绘此一现象的随葬品，如放置在宫殿般中的青铜镶嵌器和漆盒等，从实际的墓室结构中，我们也将发现此一现象在不同阶级层次的差异。例如四方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大小不同规格的装饰，是依据墓主身份的高低以及墓室的大小。

在墓中使用图像来表现宇宙早已出现在湖北曾侯乙墓。例如东方青龙和西方白虎的形像以及二十八星宿的名称，一起被画在衣箱的盖上；再者，如内棺上画了些保护神灵的形象，有些手中还拿着戟，其它还有蛇被鸟形和龙形等镇墓兽制伏的描绘（图9）。我们也将于后期的墓中看到有关神仙与鬼神的描写。

曾侯乙墓及其它楚墓同时也表现出对于来世的恐惧。在许多楚墓中并摆置了龙及鸟斗蛇的雕像，大概是用来保护死者免于这些邪恶动物的侵害。有关消灭恶魔的描写，也记载于《包山楚墓》的竹简，而给予我们一个有关这些恶魔可能的危害的概念³²。在汉墓中，我们不仅继续发现有关天体和天神的描绘，还有害怕被恶魔攻击的证据。

河南永城梁国刘买墓中残存的红色墓壁胶泥上，画着龙和其它神兽的形像，从此得知大部分的大型凿岩墓室，不只描绘墓主渴望的人间生活，尚包括了天国和所有的神仙世界³³。从此发展、延续出较低身份的墓主把天国特色刻画在石板或者更简单的石棺型墓室。四方神兽是极为普遍的装饰，另外仍有日、月以及他们的附属象征，如西王母、伏羲、女娲。包括牛郎和织女的星座，也呈现在许多墓中。底下我们将会看到有关游猎园的描写，此一描绘亦是人间天堂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不论是墓室或是游猎园都是完全仿造（象）宇宙。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也是属于同样的背景（图1）。在此，整个的宇宙呈现在一张帛画上，包括龙和上面的日与月。这帛画的另一部分表现了墓主本人和她的随从以及她的家人祭拜她的尸体。在这帛画的底部是地下王国的描绘。纠结的龙穿过玉璧呈现在帛画的中间，此一描绘在一些墓中被真实的玉所取代，而在其它墓中则被画像石及画像砖所取代，表现出龙与玉璧或玉璧与细绳的关系，大概是一种保护的形式。

如果我们转到中国其它使用砖而不是石头的地方，我们将发现墓室的表面通常都有绘画。特别是在洛阳，已发现一些墓顶上画有各不相同，但表现有关天国的图像。在一个东汉墓中，墓顶画着在天空中骑着龙拉的马车的人物（大概是墓主人，图10）。这些例子是很有

用的，特别是在关联到《楚辞》所描述的天国的旅程。在较早的《离骚》和较晚的《远游》，诗人本人详述跨越天国的旅程，特别是在《离骚》里提到了龙拉的马车。天国和神仙以各种不同的风格被描绘在许多汉墓，并且描写在一些赋的某些部分，我们将在底下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从《史记》的记载，我们得知秦始皇和武帝的希望和恐惧，公元前二、三世纪的人们相信神仙的图像将可以招引神仙的造访。然而也许把“象”翻译成“顺序”或“形象”，意味着关系的表现，而不全是形体的描写，可能更为恰当³⁴。

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中华书局 1959, P.1388）

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我们将可依赖建筑、画和雕刻的形像，用来解释汉代的人深信此一符合神仙和他们王国的物像，当能招引他们造访的证据。建筑、衣服和装饰必须模仿（象）神仙的形状或“象”宇宙间的关系的概念，是秦特别是汉信仰和习俗的基础³⁵。事实上，透过“象”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探求复杂的墓室结构和随葬品。

如果我们从宇宙美好的一面转向到可怕的一面，曾侯乙墓用来防御的镇墓兽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图9）。在这前提之下，我们必须先讨论秦期的兵马俑。秦始皇帝的兵马俑以及江苏徐州狮子山和北洞山刘姓皇族墓中出土较小的军队俑，是秦与汉丧葬的另一个新特色，事实上几乎是新改革。在此我将详述日本学者曾布川宽的论点，他认为秦始皇的大量兵马俑很可能是用来防御来世他将面临当时他征服六国时所杀害的军队³⁶。今生的所有局面将在来世再次呈现。因此，使用这些大量陶俑的动机可以被解释为抵御来世所有危险的万全之策。

我们已经提过曾侯乙墓的内棺画有镇墓神灵。除此以外，他的墓中仍有一只长有鹿角，可被视为镇墓兽的铜鸟。稍后的楚墓仍发现许多类似的长有鹿角的木制镇墓兽。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的马王堆轅侯夫人墓，描绘的仍是蛇一直是被攻击（特别是被鸟攻击）的对象。

和秦一样，汉也惧怕来世的鬼神，因此他们也埋葬了陶俑军队。但一般皆为小型陶俑，不是真人尺寸³⁷。所有这些军队有很多南方木俑的特色，如同那些来自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信阳楚墓、包山楚墓、马山楚墓以及睡虎地秦墓的木俑。这些秦与汉的陶制军队具有鲜明的服饰及姿态特色，用以表明军人和军官特殊的阶级和功用³⁸。再者，西安附近景帝阳陵和永城刘买墓中出土的军队俑，皆模仿南方木俑的特色而制造。他们有简化如同树枝的身体，没有手臂，身上盖着象征衣服的织物³⁹。

除此之外，人物大小的规格似乎不是很重要，例如秦始皇埋入了真人般大小的陶俑军队，而他的马车仅是实际大小的一半。也许他的官员认为这是为他的灵魂所准备，所以这马车是用较昂贵的材质——青铜所制成。中山国王刘胜陪葬了真实车马，而刘买陪葬小型的车马，却用了总数一万多件的小型鎏金车马器。这些规格上的差异，事实上说明了这些军队和车马是用于灵异世界，在那儿需要的是正确的模型“象”，而不是大小的一贯性。模型“象”是重要的而非大小。

汉代东方诸侯国国王呈现另一种对灵异世界的害怕。例如他们小心翼翼的堵住凿岩墓的出口，在东方徐州楚国墓葬中，这障碍至少由八道方形巨石形成堤状堵在入口通道。在河北满城及其它墓葬，也使用石门以铁浆封固。从其它观点来看，石头构造的墓室也暗示着墓主

人的忧虑害怕。小心选择这种石材建筑物可能是基于保护这些国王和王子的来世，防止恶魔的攻击，而另一方面也许也防止这些刘姓皇族返回人间，造成后世子孙的麻烦⁴³。因此这来世的宫殿，在某些方面像人间的世界，在另一些方面也许不像。换句话说，这宫殿和墓室是相似也是相关的。

鬼神的存在和它的影响力，可从靠近泰山墓葬的位置和秦与汉的石刻铭文中找到证据，因为这些石墓都位于泰山不远的地方。泰山是群山中最被尊崇的一座，也是主要接近天国和被认为接近地下世界的入口。一旦把墓置于这个吉祥地带，住在墓里的人便有可能希望见到神灵和不死的仙人。特别是秦始皇，在东方竖立了一些石碑，上面刻满了赞美自己伟大功绩的铭文。如同那些墓很可能居住在神灵世界之中，这些铭文竖立在这里因此神灵也可能会看到它们。就像那些石墓本身，很可能秦或居住在东方齐国的人，经由建立中山国的狄族⁴⁴，从伊朗和中亚学到把铭文刻在石头上⁴⁵。

玉的角色

选择玉作为墓中随葬品的一部分，并附加这珍贵物质的永恒耐久品质到所描绘或模仿的宇宙的图样。玉在刘姓皇族中更是受到重视，事实上，玉在他们大部分的墓葬中被充裕的使用。在徐州一些刘姓诸侯王的棺木中装饰着玉璧并且排列着玉板，和满城窦绾棺木同样的装饰（图 11）。这个习俗是从战国晚期传下来的，在晚期安徽楚墓和东方的齐国和鲁国，这些玉璧被用来铺在尸体上⁴⁶。如此多量的陈列，大概是有意借此保护尸体。选择玉璧也许源自此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习俗，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可能在偶然的时机中被发掘。事实上，新石器时代的玉并入汉墓（比如玉琮被用来作为刘胜玉衣的一部分），证实了汉诸侯王借着某些手段，成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拥有人。玉璧使用在刘姓皇族的墓中，不论是铺一层在玉衣里或是装饰在棺木上（在较低阶级的漆棺，尤其是湖南、河南和陕西这些离玉矿较远的地区，玉璧通常是用画的）⁴⁷。事实上，玉衣本身可视为一种保护的形式，防御身体受到攻击。在日常使用器具这一部分，我们将注意玉器仿制漆器和铜器的风格，也许不只使它们更具价值，且更具实用。

石头也许被视为玉的低廉替代品，并且因为它可以大量获得，也可使用在制造巨大的项目上。再者，就因为玉制容器可能比漆器更耐久，所以石制的棺和墓室也会比木制的棺或漆制的棺更持久。因此，在较小的石板墓室中的石雕人像也有代表永恒的特征。对于墓的联想，于是一方面受限于它所呈现宇宙的形式，而一方面也受限于模仿所用的材料。其次，玉石是令人联想到永恒的材质，墓室的结构和障碍，以及它以玉璧、饰板和玉衣的形式出现，都是用来防止入侵者。

有关复杂的联想是产生于类似或外形的模仿以及特殊材质的选择，这一个例子发生于墓中玉制武器的使用。玉戟发现于徐州和永城⁴⁸，它们的外形产生抵御和坚固的联想，它的材质暗示这武器有异于日常一般的功能。事实上我们将看到更多在这方式产生的石制品或玉制品，包括日常用品如玉制器具，和更为异常的，如大型及小型的玉雕或石雕飞马、熊、虎等奇妙的生物（将于本文第二部分进一步讨论）。我们也可以视这些物质赋予这些生物的外形“象”的概念，因为玉具有永恒的属性，是与宇宙神仙永恒的特质相类似的。

仆人、用具和个人装饰品

记载在《礼记》有关孔子的论述和孟子的言论，指出从人殉到陶俑葬俗的改变。这些批

评似乎证实了陶俑的使用，但也指出了这些似人的陶俑有鼓励人殉的可能⁴⁸。然而这些批评在后来也渐渐合理化了。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些墓葬陶俑的发展，最有利的办法便是去观察楚文化扩大的现象。这些俑是和日常器具及乐器埋在一起，这又是楚文化的传统。

之前提到关于秦兵马俑和汉陶俑军队和车马俑，许多秦和汉俑的基本特色都源自湖北、湖南等地的习俗。特别是秦与汉的军队俑复制了适当的各种类型战士，正确的服装和姿态。在这方面，汉代的侍从陶俑跟随楚的传统，这些人物有特别详细的服装。那些在徐州小龟山、北洞山等楚王墓中的俑，身上著有小心翼翼地画上的服装和不同样式的发形。大体上，这些形式很类似那些木桶，都是很小心地描绘服装⁴⁹。除此之外，许多秦与汉陶俑与当时木俑有极为相似的一面。如上所提，我们可能试着去解释使用陶俑取代真实的人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然而，如果这些刘姓皇族认为这些木俑或陶俑不具实际功用，那么他们就不会使用它们，因此这些皇族使用俑的动机是基于实用主义而非人道精神。事实上，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中，一个真实的人（根据他的印章，他的身份被断定是厨师）和两个可能代表他助手或仆人的陶俑埋在一起。明显地，这个诸侯王必定有一个甚为喜欢的厨师，为了保险起见，并确定在来世他仍能继续替他服务，因此将他埋入墓中。当特殊的个人需要的时候（并非特殊类型的人，如仆人或军队），往往将这特殊的人一起埋入墓中。所以秦始皇把他的王子和妻妾和他埋在一起；南越王也许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将他的仆人埋入墓中。

除了各类型的仆人之外，许多墓俑是演员和乐师。音乐的角色也是从南方开始的。在曾侯乙墓，壮丽的成组编钟和其它乐器以及演奏它们的成组乐师埋在一起。在这地区稍后的墓，如江陵天星观，同样也随葬乐器，如弦乐器、鼓和笛子等。墓俑演奏小型乐器发生在汉墓，如马王堆一号墓。然而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形，如小型的乐师出现在一些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地区的墓葬中，特别是在河南辉县和山东临淄⁵⁰。很有可能这些早期的小型陶俑产生于两种相关的原因，首先，或许乐师在墓葬中受到重视，因为音乐的价值在楚国是很有声誉的；或许河南和山东的居民，知道楚墓埋葬乐师人物的习惯，因而也选择这同样的方式，以期拥有永恒的楚类型音乐。换句话说，在东周晚期这种对音乐和埋葬模型人物的双重兴趣可能也源自楚国⁵¹。

基于汉代对宇宙的许多观点，很可能乐师扮演的不只是演奏的角色。是否音乐和舞蹈有招魂的功用？或者在这些王侯面前产生或扮演神灵的力量？这些舞者、乐师和特技表演者或许造成恍惚如梦般的状态，如周繇在他的《梦舞钟馗赋》中所描写的一般，在这些如梦状态下，观者的痛苦和疑难都会缓和。事实上，只有在恍惚之中，人才能和神灵一起神游宇宙。不只是音乐，诗词（如《楚辞》和《汉赋》）也同样有神奇的力量⁵²。

仆人和乐师的模型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的背景出现，他们是这些王侯用来确保舒适生活的方法。曾侯乙墓提供了战国早期南方习俗的例子，墓中陪葬杯、盘和衣服，所有这些特色再一次出现于漆器和木器保存良好的晚期楚墓。

因此很容易主张汉代对器具的爱好来自南方，因为许多皇室及贵族墓中复制南方的漆器，典型的楚漆器，如鬲柱形尊和卮等类型，出现在鎏金铜器和玉器。鎏金或银制的椭圆形杯、皿和盘都仿制于漆器，其中许多早在公元前221年已经出现⁵³。一些漆器的形式也出现在精巧的玉器上，特别是出自于徐州和满城的刘姓皇族墓中。我们将看到当金、银和鎏金等物质仿效西方和北方的风格的同时，玉在中国东方再一次扮演珍贵物质的角色。而在后期及阶

级较低的墓中，这些器具便为陶器所取代，然而许多木器及漆器的特性依然保留着。例如小的陶制四方形桌和可分开的脚，仿佛是木制的一般⁵²。

在前面的部分我已提到后期和阶级较低的凿岩墓，同样的情况，仆人和乐师的陶俑以及各类型的器具，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晚期及阶级较低的墓中。在精美的画像石墓中，包括仆人、乐师、桌子及器具的整个景象，以浅浮雕或画的背景再现。这个现象发现于徐州阶级较低的墓中以及河南的许多墓葬和西北地区的画像墓中。除此之外，在很多地区也生产陶制的建筑物模型，这些模型一部分延续战国晚期秦国的传统。陶制的谷仓模型在秦国曾经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或许是导致汉墓中陶制谷仓长期使用的兴起。稍后其它农场的模型也流行了起来，特别是河南地区。在徐州和其他石墓的遗址，关于农家生活的景象和建筑，除了陶制模型之外，也刻画在墓中。为确保墓主对这些环境的满足，许多建筑物的屋顶上装饰着栖息的鸟和想像的吉祥动物。事实上，从这传统发展出吉祥动物形状的屋脊砖瓦，并被解释为好的预兆⁵³。

第二部分 宇宙的图像

在这一部分，我将论点从对于来世住所的创造和墓中陪葬物等整个宇宙，转换到描写宇宙部分的较小的物质上。在墓室的结构，我们将注意到这形像是模仿（象）宇宙的想像的特色。在所有随葬品中，最优雅的一件是描绘野外生物景象的错金银铜车饰（图2）。在此，香炉和灯也将一并讨论。这部分也将探讨随葬品的新形式和设计，对西汉早期设计和装饰特色的影响。在之前的部分我们已提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而现在我们将特别注意到的是，来自汉帝国西北边界特色的影响。

神游和狩猎园

《楚辞》和赋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主要部分。学者们早已注意到《楚辞》的风格和意义与早期在《诗经》里的诗集很不相同。虽然很多《楚辞》里的诗是汉代完成的，但是《离骚》被认为是战国晚期楚国的作品。最明显的特色是诗人对跨越宇宙行程的描述。这宇宙包含了现世的地带和危险的天、地极端的神灵世界。同样的描述也见于《招魂》和《远游》等较晚的汉代诗篇中。

哲学性的文集《淮南子》和汉代的赋，清晰地延续楚对宇宙的图像，这两者都有明显的南方根源。《淮南子》是来自于南方，刘安所统治的淮南国的作品；而赋则似乎是发展于传统，而被司马相如引进汉朝廷的，司马相如本人也是一个南方人。赋经常被视为传统的宫廷文件，在早期至少多半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叙述者和听者心中产生宇宙的一些来源。甚至如那些意图描写狩猎园的赋，似乎也在描写统治者超越宇宙无边的力量。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诗中了解，如《上林苑赋》形容狩猎园是整个包含自然和神灵世界的缩影。

同时相关的，赋也可能在某些场合包含宗教自然的魔法和叙述，就如同Mark Lewis和Donald Harper在他们文章所提的。此外，在东汉张衡的赋中描写在皇帝面前了解宇宙的情形，如同在狩猎园看到的景象一般。此时一个神奇的野兽出现，而在它的背上突起一座充满神奇动物的山。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奢靡……女娥坐而长歌……

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生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踔踔……（张衡《西京赋》，北京中华书局 1977，P.48）

藉由这段插曲，我们可以证明对生动的居住景观的了解或表现，是这表演的主题，事实上那也许已在皇帝心中产生对宇宙观点的认识。

在这心情下，我们应该探讨那些组成地下宫殿精美出土物特色的多种组合面貌，因此这一部分将延续之前的探讨：墓中宇宙的描绘，包含其它较小或甚至小型的项目。在这讨论中，一些重点将集中于从不同来源因素的组合：来自楚国的漩涡纹，通常称为“气”；来自中国中部及南方的传统玉雕龙的形象以及来自西北地区动物相斗的形象。

马王堆棺木

本节讨论将从轂侯妻的装饰棺木开始。马王堆一号棺木结合了楚的要素以及取材自西北方设计的细节（图 12），这些棺木将首先被讨论，因为它们提供了结合不同来源特色的例子。这些棺木事实上是大型凿岩墓之外，阶级较低的墓描绘宇宙的另一版本。无疑的，棺木是联结神灵世界，提供一个描绘它们装饰品的的基础，而其它随葬物上的相关设计，也描绘了神异国度或是宇宙的状况。

首先且基本去了解这些棺木形象的，便是有时候称作卷云纹或“云气”的纹饰，已在上文有关“文成作画云气车”提到。在正式的措词，这些卷云纹是从公元前三世纪的对角线画及镶嵌纹饰中发展而来。一系列的卷云纹互相联结在一起，形成外棺设计的骨架（图 12a），而一个相当形式化的卷云纹版本，出现在中间棺木的一边。后者与公元前三世纪包山楚墓的棺木装饰有密切的关联，包山的漆器卷云纹设计似乎转化成鸟或龙。而在马王堆的卷云纹，似乎指的就是“气”。这个“气”的纹饰出现在鸟和神兽攻击蛇的深色内棺上，在这形式下，马王堆的漆棺画和曾侯乙的内棺画是相似的（图 9）。

当我们转到红色的中间棺木（和永城墓中所涂颜色相关）和考虑不同边时，我们面对着天国的描绘和宇宙上层国度（图 12b-d），这些应该和上述有名的帛画作比较（图 1）。如前所提，这些出现在棺木四周和帛画上的龙，它们的形状均脱胎于大约公元前五世纪众所周知的玉雕龙外形，它们完整的外形出现于曾侯乙墓和中山国的玉佩。在帛画和漆棺的一端，这些龙穿过玉璧使人想起了玉璧和龙的结合（12.b），这些特点也发现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曾侯乙墓。在帛画上，特别详细地描写附加在天上的龙，使它们处于与日、月同样关系的立场，借以表现那是龙所存在的天上王国。

但是更多的情节出现在漆棺的顶部和长的一边，在这里，龙结合其它出乎意料之外的野兽一起出现。在棺盖上装饰着明显的龙、虎相斗的景象（图 12c）⁵⁴。在中国人的认知，龙与虎是不同方位的表示。在此，这象征性的角色将西亚打斗关系的动物替换，如牛和狮子或狮及山羊（图 13）。同样来自中国边境的图案——一匹扭曲、跳跃的马，出现在棺木的长边上（图 12d）⁵⁵。这些可用来和可能制造于中国北部、中亚或欧达斯（Ordos）地区而出土于山东临淄商王村的公元前三世纪末的齐国墓中的小型镶嵌器比较（图 14a）。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有关龙的造型时，产生对它直觉的描述、关联和它的意义。然而当它和其它动物一起出现时，这些从西亚引进的特色和动物，不论是这些动物的姿势或是它们带给观者暗示，都指示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从文章中我们知道动物的相斗是皇室仪式的一部分，并被认为是宇宙中自然相斗的描写⁵⁶。在这情况之下，全然外国的主题，被诠释新的

地方意义。因为动物相斗的主题在西亚已有一段很长且很古老的历史，它也被伊朗、中亚、西伯利亚和欧达斯（Ordos）地区所选择并采用（图13）。

我们可追溯公元前六到四世纪末，当外来品传到中国例子：在晋国的铜器设计，结合了狮子和半狮半鹫的生物⁵⁷，在一个精美的青铜镶嵌器，铸造了带有翅膀野兽的形式；或是来自中山国狄人墓中老虎吃动物的造型。在公元前三世纪，相关的主题出现在齐国。然而他们必定得到一个新鲜的刺激，因为青铜镶嵌器（图14a）类似来自阿尔泰山帕西瑞克（Pazyryk）地区墓葬的木雕（图14b）。再者，玉雕涉及像猫样的龙（螭），这种风格是从老虎演变而来（图16；25 b）。这些新主题的类型，我们将在底下看到，是从伊朗经由南西伯利亚和欧达斯（Ordos）地区传入中国。事实上，刘胜和南越王墓中，出现在金带饰上的巨角羊头是源自于西伯利亚及欧达斯（Ordos）地区的木、铜或金饰品（图15）。

于是很可能地，马王堆棺木上具有伊朗或游牧民族特色的图案，是经由齐地区传送到湖南。同样的方式，统治现今广州的南越王接受了东方风格的墓室结构和玉装饰品，他的宫廷也传递此种动物相斗的纹饰适于玉雕的观念到极南的地区（图16）。但是这改变的最基本要素是中国的统一和对神灵的强烈的兴趣，以及秦始皇和汉武帝对这些神奇力量的向往。

景观和异兽

比马王堆稍后的一些漆器和鎏金随葬品，通常描绘动物置身于像“气”一样的卷云纹当中，这是很多漆器上典型的装饰⁵⁸。然而最特殊的例子是装饰着金、银、宝石的青铜镶嵌管⁵⁹，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件来自河北定县三盘山的镶嵌青铜管（图2），这件已被广为讨论，特别是巫鸿，他认为这上面的生物是一种“祥瑞”的表现⁶⁰。

当我们单独审视这些动物时，虽然一些可能被当作送给皇帝的贡品而被解释为“祥瑞”，但是像这么一个具有大群生物的景象，倒是更接近赋所描写宇宙的情形。此外，凝聚这四部分在一起的卷云纹或“气”，暗示着和楚的关联性。正如马王堆棺木上的卷云纹，象征着宇宙部分的活动画景，因此这里的卷云纹也有相同的感觉和功能。在此我强调我们应该“观察”诗中及装饰上有关宇宙部分的描写：

其山则盘纡踞郁，隆崇崔嵬；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北则有阴林巨树……其上则有赤猿螭螭，鸕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北京中华书局1959，P.3004）

把景观装饰在铜管上是很不寻常的现象，包括有翅膀的马和至少两则老虎攻击野兽的例子，其它鹿、熊和鸟也都是显著的例子。此外，最精美的例子是一条龙、一个反身骑在马背上的射手，后半部是一匹马、一头象、骆驼和一只孔雀。许多这些生物不是具有异国的联想，便是实际上从西方选择来的题材。这些相斗的动物、鹿和飞马等题材都是发现于欧达斯（Ordos）地区、南西伯利亚、伊朗及美索不达米亚。反身的射手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设计，此例也发现于中亚奥克斯塞斯（Oxus）地区精美的象牙上（图17）。熊的形象是汉代不寻常的发明，然而这些熊却到处可见⁶¹。在汉代早期的艺术品上，这些生物可能改编自西方狮子的形象，围绕在狮子颈上的鬃毛，可能被用到熊脸上的鬃毛（图19）或者是老虎（图18），因为狮子是不被中国人所熟知的。无怪乎中国人为这些动物寻求另一种解释，于是乎这怒吼的狮子被熊所取代，而它们的嘴常是攻击性的张开着⁶²。

再者，不论是精美的铜管和动物的自由漫步形像，或是用来当作器具足部的小雕刻，通

常是鎏金和镶嵌宝石的。这些特色包括野兽的残忍性、它们的站姿和所用材质，特别是金和松绿石，都是伊朗、中亚和西伯利亚金属工艺的特色。然而，在晚期，熊的主题出现在巴克特里亚（Bactrian）金器上，或许这是取材于汉金属工艺的例子⁶³。

熊仅在很少的文章中被提到，例如《天问》：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P.299）

这个问题几乎可以回应镶嵌管上所描绘的形象。

山形香炉

另一个描写宇宙的形式是山形香炉的使用。它们典型的构造是由一个用以放香料的小圆形碗状物、一个崎岖山形的盖子和一个窄窄的柄所组成。这个柄常常含在龙的嘴巴或支撑在一些类似的奇妙设计上。来自中山国刘胜墓中的香炉便是支撑于一个龙头上（图 20a）。而他配偶窦绾墓中所出的香炉就更为生动，描写一个骑在龙上，手举一个碗状香炉的精灵（图 20b）。第三个来自西安茂陵地区的香炉则是一个支撑在长竹竿柄上的海上仙山，而这长竹竿柄是由龙嘴里吐出来的⁶⁴。

这些山形香炉是由两个早期和不相关的类型发展出来的：一个使用在楚国的斜截头圆锥形火盆似的香炉及一个镂空盖子豆状的容器。后者在某些感觉上是山形香炉的直接源由。可能是楚地的香炉刺激其它地区去制造香炉⁶⁵。但是，或许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来自西伯利亚。香炉在阿尔泰山地区的部落被使用来吸大麻的麻醉剂，他们的贵族则埋在帕西瑞克（Pazyryk）地区，他们很可能使用香炉和帐篷⁶⁶。我们找到一些关于公元前六世纪，帐篷和屏风引进中国北方的证据：太原的晋墓、中山国的狄族墓和在满城的刘胜墓以及广州的南越王墓，这些墓中均有用来组合帐篷或屏风的铜质构件⁶⁷。事实上只有靠假定一些重大的改变，例如麻醉剂的引进，我们才能解释这些新类型的香炉、火盆、灯、屏风和帐篷的使用，所有这些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扮演着增强的角色。

山形香炉于是附属在新物质的较大类型之下的附属品，在这些山丘浮起于海浪上的例子，它们似乎有意地比拟蓬莱：

登蓬莱而容与兮，鼈虽扑而不倾。（张衡《思立赋》北京中华书局 1977，P.216）

这些岛被认为是浮出于水面，而当靠近时，再一次消失。这些传说的来源被认为是偶而产生在中国东方海上“蕈状岛”幻觉的海市蜃楼⁶⁸。

虽然蓬莱的概念完全是中国的，如同狩猎赋的概念一般，这些描绘在岛形香炉上的生物，再一次是由汉帝国周围地区所引进的。在里头可以看到拉马车的人、打斗的动物及也是起源于古老的西亚设计的狮子或老虎对抗人的形象。类似的设计出现在来自欧达斯（Ordos）地区的青铜器⁶⁹。

当形容这些来自帝国周围地区生物的设计时，我们应该试着去说明的不是海外进口或异国特色，而是和西方地区有关系的证据，或许是神灵力量的来源。楚辞、招魂和方士这个名词，都把神灵的国度连结到所知世界的极点。主要的政治的和知识的动乱，都成为提供外国设计引进和同化在特别的中国题材的原因。

身上的铜和玉装饰品

当我们转到铜和玉装饰品的话题时，同样的问题是相关的。这部分将会经常提到以来自西亚、伊朗和中亚狮子造型为基础的脸和动物的主题。在远东地区，狮子是不为人所知，因

此这些动物常被老虎所取代，或者在汉代为熊所取代（图18, 19）。狮子的形象以不同的版本引进中国，较罕见的例子可能是以镇纸的形式出现，这种镇纸通常是一头蹲在平台似的基底上的狮子，在它的头后面有一个项圈。徐州狮子山出土的石雕飞廉，颈上有一个项圈，站在一个平台上，具有一些阿凯蒙尼德（Achaemenid）铜镇纸的特色（图21）⁷⁹。这件石雕也可以拿来和来自奥克斯塞斯（Oxus）地区的一件装饰着狮子抓鹿的象牙剑鞘作比较（图22）。这两件石雕和象牙作品都有条纹窄边和泪珠形图案描绘在他们肩膀或臀部等特色。后者是有关表现狮子肌肉的地方特色，出现在珀塞波利斯（Persepolis）和伊朗遗址如苏萨（Susa）等带状雕刻装饰的石雕。当物品，如铜镇纸复制在石头时，对于石头代表永恒的联想大概就附属于这些石雕动物了。在此，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关于雕刻宇宙的生物在小型玉雕或大型石雕的悠久传统。

在一些例子中，这些生物被当作外国样式的装饰品的一部分引进中国，许多刘氏皇族的墓中，出现了当作皮带装饰品的金牌饰或鎏金牌饰。其中最精巧的是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中的一对（图23），每一件牌饰上装饰着一匹受到熊或狼攻击的、蹲着的像马的生物，熊或狼的头出现在它的背后，因此这三种动物相互重叠在一起。马（或者是鹿较为恰当）有着长角围绕在牌饰的边缘，后面伸出小的鸟的头。有着类似角的站立的马，是众所周知的欧达斯（Ordos）地区的设计，也出现于较西的西伯利亚的帕西瑞克（Pazyryk）地区⁷¹。小的泪珠形方格，包含弯曲的浮起的棱线，明确地突出于鎏金铜牌饰，也是仿自西伯利亚木雕的例子（图23b, 14b）⁷²。

其它的刘氏皇族比较少有迷人的例子，然而都有相关或相似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一带的牌饰⁷³。包括刘胜和南越王在内的墓，出土了以另一个西伯利亚草原地区受欢迎的题材——以羊为装饰的铜牌饰（图15）⁷⁴。南越王的墓中更出土一些展示中国题材的长方型铜牌饰，例如两只缠绕着龙的乌龟，取代了马、狮子、老虎及老鹰等典型的风格。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器具，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外来的牌饰被给予完全中国的形式，这种改变也发生在玉雕上——一件来自徐州石桥的长方形框的玉牌饰和一对来自湖南装饰着骆驼的玉饰，都是这种倾向的例子⁷⁵。

当工匠在雕玉时，似乎很慎重的复制外来的皮带装饰在完全中国的原料上。他们似乎也选择和改编外来的特色，去符合典型的中国物质，比如玉璧、青铜镶嵌器和器具上的足。伊朗的狮子头造型，是唯一被采用好几世纪的重要特色。一个原型的例子是伊朗珀塞波利斯（Persepolis）的雕刻（图18），这个狮子的头有四个特殊的地方，重复出现在不同形式的老虎的头上：环绕在层层皮肤中的大眼，颊髭上的线条，鬃毛或头部的项圈以及向后折的耳朵。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时，这种狮子的头以老虎的样子出现在一些模型的部分的装饰，和侯马铸铜遗址模型的残块（图18b,c）。许多这些模型的残块带有小的老虎般的花纹，同样的头也出现在西伯利亚，在阿尔泰山的帕西瑞克（Pazayryk）墓葬中，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后期木牌饰上（图18d,e）。这些后来的雕刻可能成为汉代设计的来源，在这里向后折耳朵的原型依然保留（图18f），我们将看到同样的头也复制在玉雕上。

从尼蒙那德（Nimrod）的象牙是另一个受到影响的版本（图18），这狮子也一样有显著的项圈，但和珀塞波利斯（Persepolis）版本不同的是，它的嘴是张开的。这项圈和张开的口以各种形象重复出现在熊身上，徐州狮子山出土的以熊为图案的版饰便是一例（图21）。

在这两种情况下，眼睛、鼻子、项圈或鬃毛的特色是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汉代器具上极凶猛的熊状镶嵌足是源自于攻击的狮子，汉代使用大量的熊的形象，例如在图2的精美铜管上。这个例子揭示着一个从别处借来的主题，可能在新的地区及背景下给予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解释。

同时发生的同样的狮子或老虎的脸都并入了玉雕，最先有关外来主题影响玉雕的例子是当伊朗类型狮子头并入玉的设计时。这向后折耳朵原型后来演变延伸至漩涡状，如图24a，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玉，这个头呈现在不同类型的牌饰上，它身体的两侧出现在长方形牌饰上（图24a）。当这脸被改编在弧形器上时，这张脸压倒性地占据头两侧的修长身体（图24b），这些和翅膀纠结在一起。从这时期之后，这些主题被改编到玉璧边缘上。早期的例子出现在曲阜和商王村等齐国墓葬中，后期的例子则见于刘姓皇族墓中（图24c,d）。通常，这些较老的玉璧会相传几代，一些例子出现在南越王墓中。

同样的脸以形式化的图案出现在战国和汉代的玉剑珮上（图25）。这梯形的剑珮形式似乎是模仿自新石器时代的斧，事实上在徐州，一个装饰得仿佛是剑珮的新石器时期的斧在此出土。这些在剑饰表面上的纹饰通常是直线的，相当规则的形式，基于飞廉头的基础而发展出来的（图25a）。一个来自西伯利亚和欧达斯（Ordos）地区对照性的影响是一个弯曲似老虎的龙，通常称之为螭龙。随着鎏金铜牌上纠结的生物的装饰的出现，以及如狮子山诸侯王的使用（图23），玉匠们设计了浮游在玉器表面的螭龙。事实上来自徐州的玉器呈现了此现象。螭龙的棱纹和纽丝纹也来自鎏金铜牌饰。这些条纹事实上是从铜牌饰上棱纹部分发展出来的结构新形式（图23），如果这猫脸似的头和其它生物没有引进中国，那么战国时期和汉代的玉雕将会相当不同。

偶而这些玉装饰中除了螭龙外，还包含另一种生物，一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剑珮上还出现了一只熊，如同在宇宙游猎景致中所见的一般（图25）。一件已提过的相当不寻常的玉璧（图16），呈现着老虎似的龙与另一端的凤凰对峙着，再一次重述动物相斗的主题在一个新的且中国化的外貌（图16）。玉剑饰的装饰似乎是从公元前第三世纪丧葬的形式发展出来的（图25）。在同时期，戟也出现在玉雕上，虽然和真实的武器不尽相同，但在意义上，这些武器相当是真实的武器。这些武器可能被想来抵御来世的恶魔，而不只是人。

玉器造型的更一步改变发生在一般的弧形或称之为璜上（图26）。早期的玉佩饰上的两端装饰着相当钝的龙头，这些公元前三世纪和稍后的龙头与狮子的头有些许类似，只是有一个更尖的鼻口（图26），围绕在脸颊的细条纹指出这是来自阿凯蒙尼德（Achaemenid）狮子的项圈（图18a）。

基于山东临淄商王村发掘的基础，这些新传统的玉器年代可定在公元前三世纪，相当符合那些出土于长丰杨公乡玉器的年代²⁶。在这年代许多新佩饰造型相继出现。玉造型和特色的高峰期，似乎对南越王墓也有重大影响，并与公元前二、三世纪宇宙新形像的概念同时发生。

最后这部分所提的，大部分都是刘姓皇族或南越王个人身上的装饰品，或者是服装的一部分。当这些饰品穿戴在身上时，这些关联的动物形象，使它的拥有者置身于宇宙之中的感觉。

结 论

本论文的目的并非要对造成宇宙不同形象的宗教信仰的种类做一个完整的报告,而是关联到这些图像的主题以及“象”这概念的本质,是一种从中去了解宇宙的力量,是建立在现存世界支配下的方法,一些文献给予我们这些概念的暗示。在此得知,宇宙是在天国统治者的管理下,这统治者有时被称之为黄帝或皇帝,或是天神,它有相当于或优于世间的力量、使者及权威。换句话说,这世间的世界是宇宙的缩影。之前提到,越过神灵王国是经由大山的峰顶,比如泰山。靠近泰山有一个叫蒿里的地方,是到达地下世界的入口。关于人间生及死的记录可以查核的是黄帝或天帝官制(与人间官制相似)的发明,之后传达到地下世界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从战国时期之后,墓中出土书写工具和文件的形式,可能是墓主将带到来世当官吏所使用。发展到汉代时,这些并行的天国和地下世界的特色,更是随着人间世界的路线而更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这些与狮子山厨师、刘氏皇族以及南越王墓随葬的印章,可以确定地说是墓主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去证明他们的身份用的。

因此我们可以从现存的资料或墓中挖掘的资料得知,在汉代,特别是西汉前期,另一世界的系统是基于人间世界的模型所创造的。这并不是以为奇,就如同上面的赋所关联的,给予普及的有关“象”或仿造另一件事的概念。事实上,“象”或同意义的概念是汉代哲学思想里很重要的部分,包含有阴阳五行的相关哲学的名字之下的一个核心思想,特别和邹衍(大约公元前250年)的名字连在一起。但当我们读到从古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对不同世界的态度和他们所描绘的图像时,他们自己也看到这个相对关系的另一个角度。这便是他们生活的特色,如同在丧葬习俗中,他们理解到有关联到宇宙其它面貌的特色。

在这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顾及本文提到或与本文相关的宇宙形象的许多不同的类型。这些形象实际上呈现“象”或相关的事呈现,借着这些形象的创造,另一个世界是可以看见的,这种方式之下,宇宙部分所有的面貌都呈现了。所以墓室和装饰的随葬品可能包括的不只是日常器具,也包含了神奇或看不见的,甚至自然的力量和西王母等人物。制造和表达的力量是过程描写的基础,秦始皇的墓和阿房宫,事实上模仿“象”宇宙的结构,所以给秦始皇虽死犹生的感觉,拥有统治宇宙的力量。秦始皇帝死后仍和活着一般,仍然是个皇帝。后继他者,汉代的皇帝,毫无疑问地也期待与他有相同或像他一样的被对待。墓中的图像和随葬品上的图像,显示当时对宇宙面貌的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关当时人们已有关于“宇宙图像”的功能和影响等复杂的观念。这些“图像”和支持它们的哲学,是基于秦和汉统一中国后,建筑、随葬物和肖像等构想和形式的新综合。这个统一不仅仅是政治结果,这些皇帝宣称统一宇宙的背景下,也掌握许多真实和想像的王国在他们手中。

参考书目

I. 中文部分

- 王中文 1996,《两汉文化研究》
- 台北 1994a,《殷虚地下瑰宝》
- 台北 1994b,《中国地下宫:湖北随县曾侯乙墓》
- 北京 1956,《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